

中华武术“止戈”的思想渊源、文化实践和历史影响

张国良¹, 白俊亚², 王 宾³

(1. 上海政法学院 体育部, 上海 201701; 2. 邯郸学院 太极文化学院, 河北 邯郸 056005; 3. 上海中医药大学 体育部, 上海 201203)

【摘要】: 以中国文化的“止戈为武”为切入点, 从文化史角度考察中华武术“止戈”的思想渊源、文化实践和历史影响。中华武术“止戈”的思想渊源, 既有国家治理中“德”对“力”规制的“外王内霸”话语, 也有军事实践中形成的“兵儒合流”儒家战争观。中华武术“止戈”的文化实践中, 观念的更新体现为对暴力冲突的“止戈性”见解和态度, 并对“止戈”认识标准进行话语拟定, 形塑“止戈”意识惯习; 行为的矫正表现在技术动作的“防守”“控制”“展示”“柔化”等; 关系的改善表现在冲突互动中象征资本的让渡、达成默会双赢和塑造技术权威。“止戈”在成就武术武德、武术功用、武术文化独特性的同时, 也为技击弱化埋下伏笔, “点到为止”的互动方式塑造武术武德的厚德礼让也偏离“尚短平快”的技击实质, “兵不血刃”的全胜理想促进武术功用的多维发展也违背“综合全面”的实战逻辑, “谨慎为战”的自我技术深化武术文化的内外兼修也禁锢“必试于敌”的练用实践。

【关键词】: 中华武术; 止戈; 武术文化; 中华武德; 武术伦理; 德技双修

【中图分类号】: G85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5656(2024)03-0100-09

DOI: 10.15877/j.cnki.nsic.20240606.001

“武”的认识型分为两种。一种是持戈而立、举戈而动、荷戈而行为“武”。如甲骨文将“武”字解读为“象人持戈以行”; 汉代董仲舒曰:“武者, 伐也。”^[1] 另外一种是“止戈为武”。如《左传·宣公十二年》:“夫文, 止戈为武。”“武”的两种认识型折射出中国文化对“武”的不同认知与理念, 分别定性为中国人对“武”的“现实性”和“理想性”理解^[2]。“持戈为武”是中西文化中具有共通性、普遍性的理解, “止戈为武”则是中国文化对“武”的独特解读。从语言文字学角度, 尽管这一解读受到较多质疑和批判, 如日本著名汉学家白川静认为“持戈而进为武”^[3], 但并不妨碍“止戈为武”在中国文化中的影响力及其在国家治理、军事实践、武术技击中的渗透。

已有相关研究从认识武术整体逻辑的角度论述了甲骨文“武”字具有“止戈为武”意涵^[4], 认为“武”字的“止戈为武”生发出中华武德的核心结构^[5]。事实上, “武”究竟应当作何解并非最关键的, 重要的是人们在理解过程中形成了“止戈”的价值观念。

“止戈为武”是“武”字多重意涵中影响较为深远的一种, 影响着中国人的技击观、武德观等, 渗透到国家治理、军事、武术技击等领域, 成就中华“武”文化的独特性。研究认为, 中国武术“止戈”的思维惯习与“不战而胜”的中国智慧, 既铸就了武术的独特性与文化性, 也因习武者的“集体无意识”带来了技击式微的现实问题。由此, 研究从观念、行为、关系三个方面探讨中华武术的“止戈”文化, 以武术“止戈”文化的独特性理解中华武术在世界武技之林的独特性, 为当下武术存在的若干问题寻求答案。

从大处着眼, 武术“止戈”文化的独特性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名片的新展示。习近平强调, “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 把

收稿日期: 2024-03-09

基金项目: 上海市教育科学基金项目(C2021337); 国家体育总局武术研究院课题(WSH2018B010); 河北省体育局科技研究项目(2024QT22); 邯郸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W2023341)。

第一作者: 张国良(1986—), 男, 山东日照人, 博士, 讲师, 研究方向: 民族传统体育学。

通信作者: 王 宾(1985—), 男, 山东菏泽人, 博士生, 副教授, 研究方向: 民族传统体育学。

优秀传统文化中最具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武术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其“攻/防”话语和实践所遵从的“止戈”理念，不仅是武术伦理的具身体现，也是中华民族为人处世的行为准则。在中国传统文化复兴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今天，以武术为观察基点，理解中华武术独特的“暴力观”，深化“止戈”文化认识，强化“止戈”文化自觉，在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有助于彰显中华民族在应对争端时以和平为先的“止戈”姿态。

就小处而言，“止戈”文化的独特性是对武术自身样态和发展路径的新解读。当前学界对武术技击弱化的回应多集中于训练方式落后、比赛规则不公、文化技艺转向等方面。从民族文化角度对“武”的思维和认知根源出发进行分析，重视思维方式和理念认知对一事物发展的内在性作用，可以为武术“技击弱化”提供一种新的解读方式。

1 中华武术“止戈”的思想渊源

“止戈”的意涵并非完全放弃使用武力，而是策略性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或节制性地控制使用武力的尺度，在控制暴力局面后以仁义之心止息暴力。中国文化中的“止戈”思想最早可以追溯至尧舜时期，《韩非子·五蠹》记载：“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6]通过“修教”提高自身道德感召力和“武舞”施加武力威慑的双重形式实现对有苗的征服，以“修文以昭士，耀武以止戈”（《全唐文·卷七百六十三》）的方式体现“止戈”的价值理念和行为方式。而“止戈为武”的完整解读最早见于《左传·宣公十二年》：“夫文，止戈为武。……今罪无所，而民皆尽忠以死君命，又可以为京观乎？”^[7]楚庄王在阐明“武”有七德的同时，以“民皆尽忠以死君命”为由拒绝潘党的“为京观”请求，创造性地提出“止戈为武”，体现楚庄王施武用武的“止戈”理念，也成为后世对“武”进行“止戈”注解的源头。东汉时期著名的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援引《左传》对武的“止戈”解释，“武，楚庄王曰：‘夫武，定功、戢兵，故止戈为武’”。段玉裁注：“此櫟栝楚庄王语以解武义。庄王曰：‘于文，止戈为武。’”^[8]《说文解字》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

字书，其影响力不容小觑，这也成为“止戈”理念能够在中国文化中深入人心的重要原因。武术“止戈”思想也进一步渗透到中国的国家治理和军事实践中（表1）。

表1 “止戈”的国家治理、军事实践思想渊源
Tab.1 The origin of political and military thought of Zhige

“武”的呈现领域	“武”的二元对立表征	“德”	“力”	“德”的规制结果
国家治理	霸王道杂之	王道	霸道	外王内霸（外儒内法）
军事实践	兵儒合流	儒家伦理	兵家诡道	义战思想
武术	德技双修	武德	技艺	止戈为武

在国家治理中，“霸王道杂之”治理逻辑下“德”与“力”辩证施用的“止戈”思想。“王霸之辩”是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和概念，“王”代表着“德治”，“霸”意味着“力治”。国家治理中“霸王道杂之”以及“外王内霸”（外儒内法）的逻辑，喻示着“力”始终离不开“德”的制衡，“德”与“力”的辩证施用中，透射出国家治理中“止戈”的思想。以儒家的仁德之道为尊上，施武用武崇尚“止戈”，“三教之中儒最尊，止戈为武武尊文”（《罗昭谏集·卷一》）。“止戈”被誉为圣人的治世之道，“圣人治世，威德和济；武功既成，义在止戈”（《周易集解·卷一》）。“止戈”是赢得天下人心成就统治大业的君王之道，“莫不以上圣君四海，止戈定大业。然则帝王者，宰物之通器；君道者，天下之至公”（《宋书·卷二·武帝中》）。周文王以“文”治天下与周武王以“武”治天下的政治实践，被“克己复礼”的孔子阐发为：“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礼记·杂记下》）文与武的张弛有度，表征的是国家治理中施武用武的节制性，“文/武”的辩证性和“度”折射出施武用武的“止戈”思想。

在军事实践中，“止戈”思想不仅体现在“兵儒合流”儒家战争观的形成，也体现在具有浓郁贵族色彩的军礼中“仁本”的规范化要求上。“兵儒合流”^[9]是儒家的仁义治国之道与兵家的克敌制胜之道有机结合的产物，在儒家“德”本位思想之下，以“止戈”为贵，以“用武”为恶，“兵恶不戢，武贵止戈”（《旧唐书·列传第十六》），“怀柔诚贵於止戈，执恶何惭於用武”（《全唐文·卷七十五》）。“止戈”

之武也被升华为“大武”的高度,“辟开日月洪蒙处,大武真堪擅止戈”(《半崧集简编》)。“止戈”还是兵法中“军礼”的独特思想展现,最古老的军事著作《司马法》规定,“大战胜,逐北无过十里;小战胜,逐北无过五里”^[10]。强调“兵本于不杀,武在于止戈”(《翠微北征录·卷二·治安药石序》),透露出“不重伤”“不禽二毛”“见敌如溃,溃而不止,则免”的“义战”思想。

国家治理和军事实践的“止戈”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霸王道杂之”“兵儒合流”在武术中落脚于“德技双修”(表1)。对“大国工匠”而言,提高技艺水平和道德伦理的“德技双修”之双重要求中,“德”为重。“德”是“王道”“儒家”的具化,是“止戈”的要求;“技”则具有“力”“霸道”的属性,是“持戈”的必然。“德/技”的双修导致“德/力”“止戈/持戈”二元对立间张力的平衡。中国传统文化中“德”相对于“力”具有一定优势性,“君子以德,小人以力;力者,德之役也”(《荀子·富国》),“德感主义”形成对“力”的偏见^[11]。因此,武术中表征“德”“王道”、伦

理的武德更受尊崇,习武者都遵循和探求一种“内圣外王”的习武境界^[12],在武术中“止戈为武”是“德”对“力”规制的结果。

2 中华武术“止戈”的文化实践

“止戈”在中华文化中的广泛影响,也体现在武术实践中。武术对“习武先习德”的注重、习武者德技双修的境界设定等,都是施武用武实践中“止戈”文化的呈现。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在《集体暴力的政治》一书中将暴力的观察者分为三个阵营:“观念者”“行为者”和“关系者”^[13],分别代表了暴力的三个不同解读视角。“观念、行为与关系构成了我们审视政治现象尤其是政治冲突的主要角度。”^[14]中华武术作为一种个体身体暴力的文化,展现的是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身体攻防暴力冲突,“止戈”从观念的更新、行为的矫正和关系的改善三方面影响武术文化实践(图1)。

观念决定行为,行为影响关系,关系的处理又影响着行为的生成,同时,关系和行为又能够更新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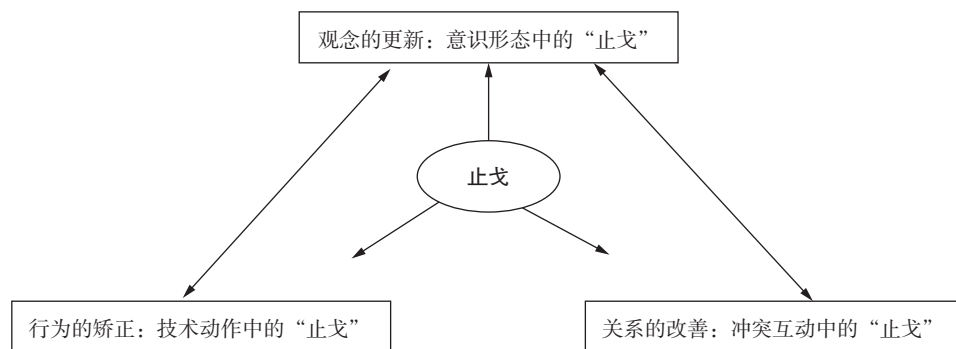


图1 “止戈”文化实践维度的关系

Fig.1 Relation of practic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Zhige

2.1 观念的更新：意识形态中的“止戈”

武术观念上的“止戈”体现在形成对暴力冲突的“止戈性”见解和态度。美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的暴力微观社会学理论认为,在暴力互动的微观情境中,人们会发生冲突性紧张与恐惧,“恐慌进攻”由紧张和恐惧产生,形成“势如破竹的进攻”(flight to the front)^[15]。“恐慌进攻”中的人被情绪节奏控制支配,武术对“恐慌进攻”发生时能够做到适时“止戈”尤为重视。如在师徒关系缔结的认识上,将暴力冲突情境中适时“止戈”规避“恐慌进攻”的能力视为一个重要考察标准,为师者除为

自身技艺寻觅“根器佳者”以继承衣钵,更注重的是徒弟的德行,拳谚有云,“学拳宜以德行为先”“未曾学艺先学礼,未曾习武先习德”。清代武术家张孔昭的《拳经拳法备要》:“贤良秘授纾危困,邪妄休传害众生。大道等闲若轻授,须防九族尽遭刑。”^[16]甚至在思想意识上将言行、神态、品性等与个体的技艺水平进行关联,不具备“止戈”品性者难以达到技艺上的“道”之维度,“再察其言论,或谦或矜,其所言与其人之神气,形体动作,是否相符。观此三者,彼之艺能知其大概矣。”^[17]

观念上的“止戈”要求不断提升习武个体的“止

戈”认识与觉悟,并对规训标准进行话语拟定。“规训”是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其著作《规训与惩罚》中提出的一种隐性权力操作模式,揭示“一个完整的认知领域、一种完整的权力类型”^[18]。规训权力通过塑造知识、规范、分类等拟定权力标准,武术教化中权力标准主要以门规戒约的方式存在。习武个体从拜入师门的那一刻就被教以各类门规戒约,甚至立下各类誓言。入门门规戒约以微观权力的方式对“止戈”理念进行外在呈现,以谚语和劝勉的方式体现止戈,拟定规训标准。谚语和劝勉的体现方式以正面引导和负面警戒双向度来实现“止戈”觉悟的塑造。正面引导如“高手点到为止,低手撞翻为止”,以及“学拳宜以德行为先,凡事恭敬谦逊,不与人争,方是正人君子”^[19],对“不争”“心平气和”等的强调,目的在于强化习武者内心的“止戈”觉悟。负面的警戒、劝勉,则指出缺乏“止戈”认识的严重后果,“逞强伤人,寸步难行”,表达出对无限度“持戈”行为发生的反对意向。武术也以明文规定戒约条款的方式拟定话语规训标准,如《少林拳术秘诀》,“宜深体佛门悲悯之怀,纵于技术精娴,只可备以自卫,切忌逞血气之私,有好勇斗狠之举。犯者与违反清规同罪”。对不能“止戈”的行为上升到与“违反清规”同等的劣行而遭受惩罚。

观念上的“止戈”也表现为习武场域“止戈”意识惯习的形塑。惯习是布尔迪厄社会核心思想的概念之一,体现的是一种延续性,在不断的创造和建构中,形塑出习武个体“止戈”的意识惯习。教化过程中将仁义、忍耐等优良品德植入习武者的品性之中,“习武先挨打,笑脸迎人欺”,即便被“欺”也要笑脸相迎的思维意识,锻造习武个体的“隐忍”品性,形塑“止戈”惯习,为干戈相向之时的“止戈”奠定性情基础。日常训练中以把握“分寸”的形式形塑“止戈”意识惯习,“既得艺,必试敌”,对练、喂招、切磋是武术的常见训练形式,“疆场搏敌莫留情,切磋拆拳手宜轻”,切磋、拆拳训练中把握技击分寸,强化止戈意识,形成“止戈”意识惯习,这种意识惯习一旦形成,即便移植到不同的暴力冲突场域中,其延续性也依然存在。“止戈”意识惯习的形塑也渗透于师父的身教中,贯彻“切勿把学生打怕”^[20]的理念,在体悟教学过程中以身作则的适时止戈,既完成“持戈”的训练过程,又促使学生“止戈”意识惯习的

形塑。

2.2 行为的矫正:技术动作中的“止戈”

多重表达“防守”以凸显武术“止戈”意象。武术相比于其他武技而言,更注重对“防守”意蕴的表达。拳击、泰拳等武技无不是以“短、平、快”击倒对手、战胜对手为目标,而武术在追求“不得不打”时的“击必中、中必摧”的过程中,产生出诸多目标指向为“止戈”的防守技术动作,侧重对来袭暴力的化解与避让,如吴云倬对太极拳的阐释,“若能不用正面抵抗,而将敌人向另一方向引化,则活泼得势矣”^[21]。“人不知我,我独知人”表达的也是随时可出击或“止戈”的防守策略。例如,八卦掌“回身掌”三重境界的“走”:一是,一触即走,倏而就回;二是,遇强敌不得不撤走,倏而就回;三是,真走,对方不追就走掉,如果对方追来,再回身打击,诱敌深入^[22]。由此,可以解读出武术注重“防守”的战略意图,对“走”的强调除战术上的考量外,也有“真走”的成分,除非对手穷追不舍,才回身打击,可见八卦掌是将止戈与战术融合为一体的。

追求“控制”境界以表现武术“止戈”愿景。控制技法意在防止自身受到暴力侵袭并制止对手的暴力,同时也具有保护对手的意图,拳谚有云“打人容易放人难,放人容易制人难”。既然“制人”是最难的,为何不直截了当“打人”“放人”,而要通过“控制技”将人制服。例如,擒拿术《两仪阴阳诀——乾坤八字法》:“坤地阴柔后手先,柔中抱刚意中粘。避闪腾挪退为进,缠滚挫绕走惊弹。一顺二化三拿锁,四旋五吃六滚翻。”^[23]其中,缠、滚、挫、绕等技法以“化”“拿”“锁”为技击宗旨,目的在于止息双方的干戈,既不重伤对手,也阻止对手伤害自己,以控制技实现暴力的消解,体现出“止戈”理念。《罗汉行功短打·序言》云:“不过截其血脉,壅其气息,使心神昏迷,手脚不能动,一救而苏,不致伤人。……方不负圣人一片婆心也。”^[24]使对手不能动、不伤人的“圣人婆心”,也体现出武术的“止戈”理念。枪法中有“枪注人喉,不敢动而罢”(《手臂录·附卷上·石敬岩枪法记》)的训诫,“枪注人喉”而止、击落对手器械、击刺对手手腕等身体部位。如此等等,都是武术“止戈”的体现。

注重功力“展示”以寻绎武术“止戈”路径。功力“展示”是武术的重要内容之一,以手劈砖、金钟

罩、以喉断枪、铁砂掌等功力展示的目的在于“不战而屈人之兵”。武术习练者尤为注重功力训练,且往往以此为较技的方式。功力展示性技术动作不仅仅用以提高自身功力克敌制胜,而且成为习武者向对手“炫技”的方式。另外,武术套路的演练水平也是“展示”的重要方式,原始武舞“执干戚舞,有苗乃服”是通过套路展示以服人的典范。武术套路的演练水平虽然不能够直接衡量一个人的技击能力,却能够向对手展示一个人在武术修炼上的“工夫”,继而达成技击能力的想象,以此实现“止戈”的功效。不论是武术功力还是武术套路展示,对普通人而言都是一种武力上的威慑^[25],可以起到不战而屈人之兵之效;对同为习武之人而言,武术功力和武术套路的水平判断遵循相同的话语规则和评价标准,以群体共识的方式进行相互认证,自知技不如人时,往往知趣地甘拜下风,进而实现“止戈”。

对“柔性”器械的选择表征武术“止戈”理念。武术在技术动作上的“止戈”还表现在舍弃具有较大杀伤性的武术器械而以杀伤性较低的“柔性”器械或物体代替。“人无筋骨之强,爪牙之利,故割革而为甲,铄铁而为刃。”(《淮南子·兵略》)在武术比试中对柔性器械的选择,是为规避“打一个人惹一辈子麻烦”的困局。对器械的取舍策略,既有蔡桂勤先生用“鸡毛掸子”代替“剑”,通过“苍鹰旋翅”“蜻蜓点水”等招式展现中国剑术的精妙,以它物代替器械,击败了擅长剑道的日本人^[26]。也有为降低器械杀伤性而采取枪去枪、刀不开刃、裹以布帛等处理方式,如《纪效新书》中“横头用无刃铁梁,柄头用平顶铁箍,长不逾眉”。少林寺以“木棍”为主,规避刀剑以体现习武者的“止戈”理念,“棍是钝器,且为木质,杀伤力远逊于刀剑等金属利器,使用木棍,显然较为符合仅能有限度地运用武术的佛门弟子身份实际”。

2.3 关系的改善:冲突互动中的“止戈”

在冲突互动中,让渡个体的象征资本实现关系的“止戈”。象征资本是相对于“有形”资本而言的,在布尔迪厄《实践感》中指一种“荣誉体系”构成的象征关系^[27]。习武者获得一定的象征资本后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进行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间的转化。而象征资本的获得来源于习武者自身的武技水平、武德修为、武术声望等,拥有象征资本也

意味着在人际圈中形成一定的权力关系,可以获得一众习武者的追随,为维护自身的权益,象征资本是习武者尤为看重的,“驱使人们捍卫象征资本的利益,是与对客观地铭刻于(广义上的)经济秩序规则性之中的公理体系的信从不可分的”^[28]。而在冲突互动中选择“回避”实际上是有损个体象征资本的,耐人寻味的是习武者往往选择“回避”的方式来避免双方的冲突互动。武术冲突场域中,习武者的象征资本(名气、战绩等)往往是他者发起挑战的理由,是向武术界发布的战书,挑战者通过获胜来降低对方的象征资本,提升自身的象征资本。若选择“回避”(止戈),则意味着个体象征资本的让渡。习武者往往在冲突互动中选择“回避”,既不战胜对手剥夺对手的象征资本,也不被对手战胜,而是以“回避”的方式避免冲突互动的发生,主动让渡一部分自身的象征资本给对方,改善互动双方的关系,实现“止戈”。

达成默会双赢以维系冲突双方的良好关系,实现关系上的“止戈”。默会的知识(Tacit Knowledge, 又称缄默的知识或隐性的知识)需要的是理解能力和领会能力,与显性知识不同的是,默会的知识具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性质,虽然“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但并非所有的冲突互动都需要结果,达到“无果”的双赢是最圆满的结局,是武术“止戈”的文化表征。而在互动中究竟何者胜出,则通过默会的方式各自体悟。武术拳谚中有“三分保平安”之说,即“带三分笑,让三分理,留三分话,藏三分技,交手让三分”^[29]。让三分是将胜利成果进行适当的让渡,是一种止戈的智慧。既有双方旗鼓相当的情形下“谁都没有输”的话语表达,如意拳王芗斋在比试中十局输了六局,从竞技的角度来看是输的一方,但对手却从技术具体化应用的角度出发,对结果进行和谐化解读,最终二者从“比分”和“技术”的不同角度各自成为赢家^[30]。通过话语的周旋与解读生产默会或缄默知识,它镶嵌于武术实践活动中却又以隐性知识的方式存在,使双方都能够欣然接受,获取双赢进而实现“止戈”。也以他者“缺席”的方式刻意使冲突“无果”,进而得到良性结局,如形意拳大师尚云祥关门避人耳目、打赢对方后让其整装再出门,看重结果的“能否服人”^[31]。冲突双方以默会或缄默的形式表达、传递基本事实,这样即可保全自己或

拳种门派的名誉,规避伦理上的关系损害而导致不间断冲突,实现关系上的“止戈”。

塑造技术权威可以形成合作与服从,从关系维度上实现“止戈”。哈丁^[32]认为,“合作与服从的规范有助于让人们各就其位”。权威可以实现人们对权力的自愿服从和支持,恩格斯在《论权威》中认为权威对于维持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行是非常有益的。武术权威的塑造通过“功夫”和“武德”两个文化产品的生产,在冲突互动中保持“持戈”与“止戈”的合理张力。冲突互动中的持戈相向难免造成伤亡,而很多时候冲突的不可避免性,令人们选择适时止戈的策略,既要取胜又要有免于无限扩大事态的效果。如镖车遇到劫镖时镖头会喊“鞭虎挡风”,意为将人吓跑“挡风”即可,不可真正致人死伤,以免树敌^[33]。兵不血刃地获得暴力冲突的胜利,可以通过塑造技术权威的方式将对手震服让其知难而退。要求自身具有较高的“功夫势能”,很多时候这种功夫势能都是建立在“展示性”技术动作和功力的基础上,这也

解释了为何套路、硬功等“展示性”技术动作在中华武术中较多受到重视。

3 中华武术“止戈”的历史影响

武术“止戈”,内化为习武者引以为傲的为人处世准则和规范,外在呈现于武术技法、武术对抗比试中,极大地丰富武术在现实中的存在样态。点到为止、兵不血刃、谨慎为战是武术文化“止戈”的三个方面,对应于关系、行为、观念,表现出递进的层递逻辑(图2)。

武术“止戈”文化在关系上“点到为止”的互动方式塑造了武术武德的厚德礼让,行为上“兵不血刃”的全胜理想催生了武术功用的多维发展,观念上“谨慎为战”的自我技术深化了武术文化的内外兼修。然而,就一项武技的价值使命而言,舍弃短平快的制胜而处处以“止戈”为考量,也导致在技击能力上的“弱化”,成为当今中华武术与西方武技同台竞技时被广为诟病的一个症结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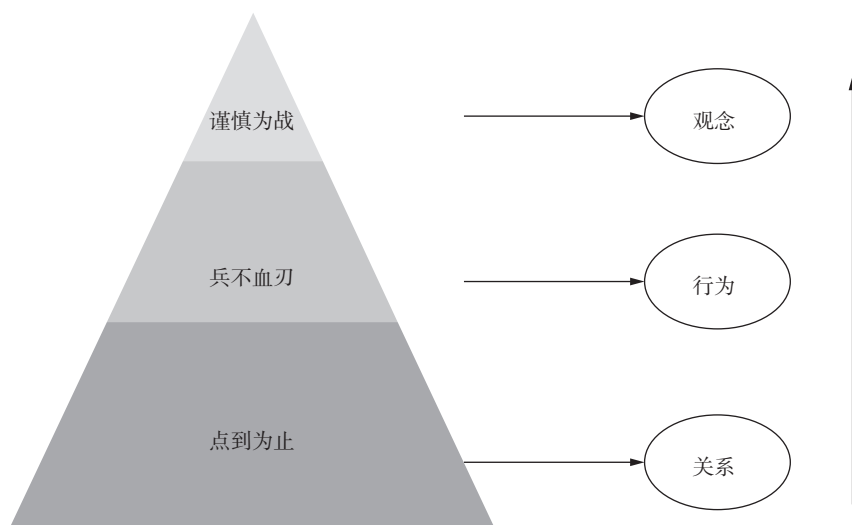


图2 “止戈”的层递逻辑
Fig.2 The level of logic of Zhige

3.1 “点到为止”的互动方式塑造武术武德的厚德礼让,也偏离“尚短平快”的技击实质

“武”字“止戈为武”的原始字义沿着人们对于“暴力”规训的逻辑生成“武德”^[34]。有观点认为,当代社会武术“打”的价值逐渐让位于道德教化价值和文化价值等,事实上,武术“打”的价值与道德教化价值并非截然对立,在“打”中“点到为止”恰恰是最为有效和最具武术文化特色的道德教化。相互切磋交手时,双方均应恪守礼让为先、点到为止的竞

技道德,不下毒手,不恶意伤人,在技艺相较时手上要有分寸,塑造的是习武者的“手德”^[35]。“点到为止”的冲突互动方式,体现的是关系上、行为上的克制与隐忍,是得饶人处且饶人的中华传统美德。“点到为止”的互动方式,使习武者在武术技击对抗过程中以儒家的厚德、仁爱约束自己,以击打的适度性、礼让性要求自己,体现“德性与能力”的内在交融^[36],展现一种智慧形态的境界。“点到为止”是暴力冲突互动关系处理中的技击理想,是由技入道的

“名士风流”,引领着广大习武者竞相追逐,也是对厚德礼让武德武礼的追求。

就美国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37]的“互动仪式链”理论而言,暴力冲突互动双方处于共享的情境中,具备特定场域的身体共在,“点”与“止”触发出共同的情感体验,使“攻/防”连带的反馈弱化。尽管武术实战技击有着“击必中、中必摧”的要求,但是,“止戈”所激发的“点到为止”,在技法运用和技战术发挥方面将出现下意识的“有所保留”,在暴力冲突中修复断裂的互动仪式链条,或是刻意追求一种“点到为止”的“名士风流”境界,从而偏离技击的“尚短平快”实质。事实上,在真正的对敌比试中,“点到为止”的难度是非常高的,甚至可以看作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技击理想,“是一种‘理想化抑或异化’的比试模式”^[38]。吴旻在《手臂录·附卷上·石敬岩枪法记》中认为,“石师交手,意思安闲,如不欲战,俄焉,枪注人喉,不敢动而罢”,但其也指出“枪亦重临阵有用者,习时稍容情,即临阵无用矣”。可见,“点到为止”式的“稍容情”是不利于实战技击的,在互动关系层面上的“止戈”致使冲突互动仪式链的修复,在互动仪式产生并进行反馈循环的过程中冲突性被弱化,暴力难以“短平快”的加以实施,偏离“短平快”的技击实质,因“临阵无用”而不足取。

3.2 “兵不血刃”的全胜理想促进武术功用的多维发展,也违背“综合全面”的实战逻辑

《孙子·谋攻篇》云:“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体现出“全胜”的对敌理想,《荀子·议兵》亦云:“故近者亲其善,远方慕其德,兵不血刃,远迩来服。”行为上的“兵不血刃”是“止戈”文化影响下最理想的技击取径。为实现“兵不血刃”的全胜理想,武术并非只注重“打”之实效,而是倾向于如何彰显“打”之意境、过程、效果,甚至是艺术化地进行彰显。将武术动作幅度夸大化、表现形式艺术化,目的在于形成更强烈的视觉冲击而增强震慑力。武术套路讲求“四击八法十二型”,强调武术套路演练的节奏、意境、神韵。同时,注重内壮功、外壮功、轻功、柔功等功力训练,以铁砂掌、金钟罩、水上漂、以手劈砖、以喉断枪等功法功力震慑对手达到“兵不血刃”的全胜理想。由此促进了武术套路运动、功法运动内容的丰富,促使武术艺术化、娱乐化、健身化功用

得到多维发展。

“兵不血刃”的理想化实战追求本身并没有错,问题在于,武术过度聚焦于实现这一理想化状态的路径,使技击路径异化为评比“知己功夫”的间接方式^[39],违背实战倚赖“综合全面”身体机能的逻辑,催生武术中“展示性”技法的盛行。如对“舞”意境和气势的注重,对“功力”造诣和功夫水平的修炼等,目的在于令对手慑服而达到“执干戚舞使有苗服”的“止戈”效果。“展示性”技术动作塑造的功夫权威收到“止戈”的实效,但是这一路径是真实暴力冲突制胜方式的艺术化,事实上,“展示性”技术动作经不起实战的检验。“展示性”技术动作的“一舞剑器动四方”(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和“手劈枯树”“拳打石墙”等“物对手”^[40]在场达到令对手羞愧或拜服的效果,但它们在“两两相当”的较技过程中并不必然具有技击的时效性,难以从现代运动训练学理论上整合速度、力量、协调性等身体素质实现对敌的“击必中、中必摧”,于是难免出现中央国术馆“国术国考”中“国术场成了斗鸡场”^[41]的尴尬。“兵不血刃”的全胜理想在行为层面上催生对“展示性”技术动作的追求,现实性的实现“止戈”,也导致在实战对敌中“偏于一隅”^[42]的自我性“功力满足”难以应对瞬息万变的暴力冲突情境。

3.3 “谨慎为战”的自我技术深化武术文化的内外兼修,也禁锢“必试于敌”的练用实践

“自我技术”^[43]由福柯的“权力/技术”理论发展而来,个人通过自我的规制把自己建构成伦理主体,具备个体自我治理性。“谨慎为战”即“慎战”的思维体现,是外部伦理规制的内化,是主体性体悟真理的过程(海德格尔的“解蔽”)。“慎战”思想是著名军事家孙子对战争的基本态度,贯穿于整个战争思想体系。相较于“点到为止”和“兵不血刃”,“谨慎为战”指代的是从意识观念上杜绝与人交手,在层递逻辑和级差上是程度更深的“止戈”。武术不仅有戒约条款“切戒逞血气之私,有好勇斗狠之举”等明文规定,即便遭到不公正待遇或挑衅时也崇尚“隐忍”,拳谚所讲“习武先挨打,笑脸迎人欺”,以克己忍耐作为习武者武德高尚的表征,体现不到万不得已“不可出手”的“慎战”理念。武术概念的表述中,“以技击动作为主要内容,以套路和格斗为运动形式,注重内外兼修的中国传统体育项目”^[44]。由

此可见,武术的内外兼修是中华传统体育文化的基本特征,武术内外兼修不仅仅是“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不仅仅是“心与意合,意与气合,气与力合,手与脚合,肘与膝合,膀与胯合”,更重要的表现为暴力消解观念对个体内心的伦理规制,在剑拔弩张的紧急时刻体现出的克制而“向内修心”。武术不仅是战胜对手,更重要的是战胜自己。“谨慎为战”的自我技术成就武术的内外兼修,是武术内外兼修中最难能可贵的环节,也是武术区别于导引养生等其他内外兼修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主要特性,在遭遇冲突时反求诸己、舍己从人,以不断向内修炼实现心态的平和、谦卑、内敛。

话语和实践方式等外部伦理内化为习武者的自我塑造和自我规训技术,控制、消解暴力能力提升的同时,也养成“不出手”的惯习。从而与“既得艺,必试敌”的练用传统相背离,使“必试于敌”的练用实践被禁锢。武术实战技能的提高,必然倚赖于实战中对技巧发挥、机会把握等因素的全面发展,“试于敌”是必经阶段,对敌理念须当如形意拳李忠轩在《逝去的武林》中所言之“一天到晚耐不住跟人比武的瘾”。而“谨慎出手”的门规戒律禁锢“必试于敌”的练用实践,“跟人比武”被异化为一种“犯戒”“违规”的行为,通过伦理建构的自我技术进行克制,将自我塑造成“道德主体”,与“必试于敌”的练用实践背道而驰,是“谨慎为战”之观念“止戈”对武术技击弱化的历史影响。

4 结语

“止戈为武”在中国文化中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对中国人认知“武”的理念形成独特的影响。尽管独特的“止戈”文化为中华武术的技击“弱化”埋下伏笔,导致中华武术在技击上对“短平快”效能的诸多舍弃,付出在“打”维度不若西方武技直接、有效的代价。但是,“止戈为武”的独特认知,影响武术在技法特色、教化实践等方面的样态呈现,由“止戈”文化催生出的“点到为止”互动方式、“兵不血刃”全胜理想、“谨慎出手”自我技术,是武术能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世界武技之林独树一帜的内在根源之一,使中华武术的“暴力观”具备更多的感性元素,有别于西方文化偏向工具理性的暴力特点。从观念、行为、关系上影响习武者对武术文化、武术

功用、武术武德的吸收,推进武术的“成人”教化,使武术从世界武技之林中脱颖而出。武术不单是一项“杀贼保命”的格斗术,成为中国人由“技”入“道”实现“练以成人”的一种方式。同时,面对暴力冲突、争端处置时,武术作为中国文化的全息缩影和代表性载体,是中国文化擅于“止戈”、爱好和平特质的最好注脚。

参考文献:

- [1]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1.
- [2] DAI G B, LU A. Wushu: a culture of adversaries. 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Sport[J]. 2019, 46(3): 321-38.
- [3] 白川静.常用字解[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
- [4] 尹永佩,戴永冠.寓势于武:甲骨文“武”字的意象考释及价值论绎[J].体育与科学,2023,44(5): 30-38,48.
- [5] 岳涛,戴国斌,苑城睿.“止戈为武”考辩及中华武德核心结构探讨[J].体育学刊,2023,30(1): 40-46.
- [6] 韩非.韩非子新校注[M].陈奇猷,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 [7] 洪亮吉.春秋左传诂[M].北京:中华书局,1987.
- [8]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 [9] 黄朴民.儒家的军事文化传统与何休的战争观念[J].军事历史研究,1999(2): 141-149,162.
- [10] 蒋礼鸿.商君书锥指[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11] 林同济.天地之间:林同济文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 [12] 张道鑫,沙艳文,王岗.中国武术“道”之诠释[J].体育科学,2018,38(6): 84-90.
- [13] 蒂利.集体暴力的政治[M].谢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 [14] 胡元梓.当代西方政治冲突解决理论研究述评[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23(2): 146-154.
- [15] 柯林斯.暴力:一种微观社会学理论[M].刘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 [16] 张孔昭.拳经拳法备要[M].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
- [17] 孙禄堂.孙禄堂武学录[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0.
- [18] 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诚,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
- [19] 徐震.苻氏武技书[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
- [20] 弘毅.提倡国术与牺牲[C]//民国国术期刊文献集成(第27卷).北京:中国书店,2008.
- [21] 顾留馨.顾留馨太极拳研究[M].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
- [22] 刘敬儒.八卦掌述真图谱[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2.
- [23] 刘明亮.擒拿秘籍《九重天》探微[J].体育文化导刊,2012(4): 130-135.
- [24] 程大力.武德仁学中心论[J].体育文史,1990(3): 56-61.

- [25] 刘文武.论武术套路技术的“技击性”[J].体育学研究, 2024,38(1): 63-69,81.
- [26] 蔡龙云. 剑楼武术文集[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 2007.
- [27] 方俊奇.论布尔迪厄的象征资本所形成弊端的破解之道及其象征资本的再思考[J].法国研究,2019(1): 33-42.
- [28] 布尔迪厄. 实践感[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 [29] 张大为.武林丛谈[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
- [30] 王芃斋. 意拳拳学[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2.
- [31] 杨国珍,段丽梅.“发而皆中节”:武术功夫的主体生成及启示[J].体育学研究,2022,36(6): 107-114.
- [32] 哈丁. 群体冲突的逻辑[M].刘春荣,汤艳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 [33] 连阔如.江湖丛谈[M].北京:中华书局,2012.
- [34] 岳涛,戴国斌,苑城睿.“止戈为武”考辨及中华武德核心结构探讨[J].体育学刊,2023,30(1): 40-46.
- [35] 常云.从“持戈为武”到“止戈为武”——中国武术“和”的文化价值阐释[J].广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20,35(4): 90-93.
- [36] 金玉柱,王岗,李丽.中国武术“点到为止”理念的身体伦理学论绎[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8,52(2): 70-75.
- [37] 兰德尔·柯林斯:互动仪式链[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 [38]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中国的前沿文化复兴与秩序重构[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 [39] 刘文武.传统武术打之功能实现的途径、利弊及展望[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0,44(7): 26-36.
- [40] 戴国斌.武术对手的文化研究[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06(5): 65-70.
- [41] 习云太.中国武术史[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5.
- [42] 杨建营.武术拳种的历史形成及体系化传承研究[J].体育科学,2018,38(1): 34-41.
- [43] 福柯.性经验史(增订版)[M].余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 [44] 纪秋云.武术[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4.

作者贡献声明:

张国良:构思选题、拟定大纲、撰写论文;白俊亚:查找资料、拟定大纲、修改论文;王宾:修改论文、查找资料、撰写论文。

Ideological Origin, Cultural Practice and Historical Influence of Chinese Wushu “Zhige” Culture

ZHANG Guoliang¹, BAI Junya², WANG Bin³

(1.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Shanghai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1701, China;
2.Handan University, School of Taichi Culture, Handan 056005, China; 3.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anghai 201203, China)

Abstract: Taking the Chinese culture “Stopping war is a true craft of war” as the starting point, 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ideological origin, cultural practice and historical influence of the “Zhige” culture (literally means stopping war or conflict) in Chinese Wushu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history. The ideological origin of “Zhige” in Chinese Wushu includes both the discourse of “kingly ways outside and despotic ways inside” in the regulation of “power” by “virtue” in national governance, as well as the Confucian concept of “the fusion of military and Confucianism” formed in military practice. In the cultural practice of “Zhige” in Chinese Wushu, the renewal of the concept is embodied in the opinion and attitude of the violent conflict, and the discourse formulation of the cognition standard of the “stopping the war”, shaping the habit of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stopping the war”; The correction of behavior is manifested in the “defense”, “control”, “display” and “softening” of technical movements. The improve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is manifested in the conflict interaction symbolizing the transfer of capital, achieving tacit win-win and shaping technological authority. “Zhige” not only achieves ethics, functions, and the uniqueness of Wushu culture, but also lays the groundwork for the weakening of Wushu. The interactive way of “opportune stop” shapes the thick virtue and courtesy of Wushu ethics, which also deviates from the “short and fast” nature of Wushu. The ideal of complete victory of “no blood in battle” promotes the multi-dimensional development of Wushu function and runs counter to the “comprehensive and all-inclusive” practical logic, and the technical advancement of “caution for war” deepens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cultivation of Wushu culture also restricts the practice of “must try to the enemy”.

Key words: Chinese Wushu; Zhige; Wushu culture; Chinese Wushu virtues; Wushu ethics; cultivate both virtue and techniques